

清徐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清徐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目 录

军民一条心，消灭侵略军

- 高白山区抗日斗争纪事……………董元双（1）
- 对敌斗争点滴……………王志续（6）
- 忆抗日战争时期东木庄党支部建立经过……………牛 荃（15）
- 支前回忆……………王爱民（19）
- 我在清太徐牺盟会工作的回忆……………时美义（21）
- 碱场营抗日村长董荫芳烈士纪略……………郑子贤（26）
- 记日军侵占清源后的几件罪恶事实……………张立业（29）
- 日军无条件投降时的一瞥……………张立业（33）
- 谈“顺记”始末……………花连有（35）
- 一部值得参考和研究的《教育志》

——刘文炳先生编写的《徐沟县教育志》简介

- ……………马行健（40）
- 记清徐早年的几个晋剧班社……………郭维忠（64）
- 旧清源县的防疫医院……………潘善清（77）
- 清徐县武术发展概况……………陈生富（79）
- 记“涂星”田径队……………崔耀南（86）
- 徐沟“天禄堂”见闻琐记……………武 敬（88）
- 徐沟城三古桥小考……………康秉慧（108）
- 西范庄“自治戒烟局”……………王振谦（115）

密大老爷的传说

- 记清时徐沟知县密昌墀的遗闻……………牛广明（118）

军民一条心 消灭侵略军

——高白山区抗日斗争纪事

董元双

日寇血洗洛池渠 犯下滔天罪行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过多次扫荡，实行灭绝人性的“三光”政策，犯下了滔天罪行。血洗洛池渠便是无数罪行之一。

洛池渠位于清源城西北三十里处，座落在地势险要的狐狐山脚下，是一个仅有五十多户、二百多人的小山村。国共合作时期，清太徐抗日县政府就设在这里。

一九三九年五月，盘踞在清源城的日寇和伪军由叛徒任头发带路倾巢而出，扑向洛池渠，妄图一举消灭我抗日政府。他们闯进村后，逢人就开枪，见屋就放火，看见东西就乱抢，一时间折腾得乌烟瘴气。这次扫荡，共抓捕当地群众和清太徐抗日干部三十多人，均用绳子紧紧捆绑起来，集中到打粮场上进行残杀，并威逼村里男女老少都前去围观。日寇杀气腾腾地立在打粮场上，嘴里呜哩哇啦地叫着。不一会，一个军官模样的大声嘶喊，排成一行的鬼子手持枪刺，残无人道地向被抓捕的人捅去，一个个背上被捅了七八个血窟窿，倒地惨死。一时血染粮场，横尸遍地，残不忍睹。群众眼看这种残景，有的泣不成声，有的泪滚不止，有的气死在地，哀痛与愤怒凝结在每个人的心间。

在这场大屠杀中，洛池渠村武根生全家五口人都惨遭杀害，武不喜母子二人同被刀杀。武三春被抓后，鬼子让他先给担水，担完水，同样未免一死。藏在屋里的武三亲的父亲，活活地被鬼子点火烧死。

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间，这个抗日根据地——洛池渠村，先后被日寇血洗过七次之多，杀害干部群众七十多人，烧毁房屋三百余间，抢走大牲畜五十多头，猪羊难计其数，其它财物更无法计算。至今洛池渠还残存着被日寇烧毁的破墙断壁。

充分发动群众 开展对敌斗争

一九四二年秋，县委派郭健同志任清太徐三区区长。他到任后，充分发动群众，白天组织民兵自卫队和区公所基干队，站岗放哨，捉汉奸，除恶霸；晚上到平川一带挖公路，割电线、破坏敌人交通，断绝敌人通讯。同时，发动群众埋粮食，藏衣物，做好空室清野工作。这样，西山一带的抗日工作便进一步开展起来了。

为了壮大抗日力量，区委在各村积极分子中，发展党员并建立起党支部，组织民兵开展地雷战，不断对敌进行斗争。当时，县委在白石沟的寺家坪办起一座简易军工厂，制造地雷、手榴弹。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，各村民兵还自制了石雷、茶壶雷、瓶子雷等土武器，采用埋踏雷、拌雷和拉雷等多种形式歼灭敌人。各村之间组织联哨，发现敌人，就在山顶上点火或扔个手榴弹，其它村看见或听到信号，就立刻组织群众迅速转移，做好战斗准备。由于群众发动广泛，加之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和有力支持，敌人在吃了苦头以后，即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推翻伪组织 建立我政权

一九四三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我县西山各村派出代表，组织

起“清算委员会”。清委会成立后，先后清算了山乡会（联村名称）伪村长李向阳的贪污罪行和马来俏等三个村副的罪行。对各村的伪区长也进行了清算。李向阳等一伙人结成政治集团，依仗权势，坑害群众，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，广大群众早对他们恨之入骨，纷纷要求抗日政府严厉惩处。清算委员会为平民愤，召开了斗争大会，各村受害者在会上揭露和控诉了他们的罪行。大会之后，将顽固分子李向阳当场逮捕，送到后方处理。对其他被斗分子也作了相应处理。这样，除掉了敌人爪牙，推翻了伪下层组织。

通过清算，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，紧接着建立我政权。六段地等自然村成立起游击村公所：村长王联席（化名李三货）、中队长董元亮，书记武志清。游击村公所管辖范围包括果子园、洛池渠、黑岔、崔家山、方山、新民等二十七个自然村。我县西山一带，无论大村小村，政权全都掌握在党员和积极分子手中。此后，抗日工作逐渐由山区扩展到平川。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工作，对平川地区的派粮派款，大多能够按要求送到果子园村。个别拖延不交的，晚上把伪村长捉到山上，教育几天回去后，也就交来了。不过，要为他们转个“弯子”，如事先和区上说好他们送粮的日期和路线，到时区上派人接走。这样，他们就能对敌人谎称说是半路上被八路军抢走了。

从一九四二年起，实际上果子园就成为区公所的所在地了。为了存放公粮，果子园打了不少土窑洞，大的可放几万斤，小的也放几千斤。村中确定四户人家负责保管，送来的粮食由他们过称、收存、发放、记帐。其它白洋、大烟土、枪械弹药等由区长董元双亲自存放。

一九四五年春天，为了便于领导，将游击村公所所辖村庄划分为三个行政村，即洛池渠行政村，崔家山行政村，方山行政村。原来的游击村公所就不存在了。

做好战斗准备 有力打击敌人

一九四四年春，日寇为了挽回败局，更加穷凶极恶地作垂死挣扎，连续发动“围剿”，妄图一举扑灭我武装力量及抗日政权。

我西山一带抗日军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战斗前作了充分准备。利用山区险要地势和复杂地形，和敌人展开了周旋。你来我走开，你走我回来。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虽然遭到八次“围剿”，却没有受到大的损失。有一次，日本鬼子包围了果子园村，冲进村里，却是空城一座。鬼子恼羞成怒，兵分几路，从梁到沟，四处抓捕群众，抢劫粮食。部分鬼子跑到离村二里多远的园皮沟，把没有跑脱的十几个男女群众截住，往村里逼赶。我十七支队四连闻讯后，当即从洛池渠赶到，以机枪向鬼子打射、扔手榴弹轰炸，打得鬼子呜呜乱叫，弃尸遍地，丢盔弃甲，逃之夭夭。

围困狐狐山 逼走日本鬼

抗日斗争形势不断发展，日寇愈来愈感到自身难保，于是在各地修碉堡，筑炮楼。他们为了切断我八分区和清太徐的要道，在狐狐山修筑工事，设立了据点。

狐狐山位于清源、古交的交界处，山峦重迭，石壁陡峭，地势十分险要。鬼子在这里设立据点，目的在于山上山下配合，围剿我抗日军民，扼住我方的咽喉，使我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。

面临这种威胁，我八分区军民决心要拔掉这个“钉子”，有力地消灭日本鬼子。首先派十七支队打了一次，未获胜利。敌人居高临下，加以铁丝网、地雷严密封锁，冲击不易，使部队遭受了损失。采用硬打的办法，难以获胜，于是我们采取围困的战术，逼使鬼子不攻自逃。

鬼子盘踞山上，有它有利的一面，但也有它致命的弱点。山头上没有水源，吃水、用水非得到山下的养天池、宋家庄挑挑驮取不可。粮食及其它物资的供给，要靠驻扎在路途遥远的高白镇的日本队部运送。根据这种情况，我们决定采取断水绝粮的办法，逼走鬼子。为此，我们在养天池鬼子取水处倾倒茅粪，或投扔破烂羊皮、狗皮。这样搞了几次，鬼子不来取水了。但他们不能不饮不用，只得到更远的宋家庄的河里去取。而宋家庄的民兵，也用同样的办法，卡住了鬼子的吃水。鬼子为了加固工事，集中人马在养天池砍树。养天池的民兵，一到晚上就在树的周围埋设地雷。鬼子一到树跟前，轰轰轰地爆炸了，土石四散，血肉飞溅。在远处的群众，听见炸声，望见此景，高兴得眉开眼笑，连声喊叫：“鬼子又坐上咱们的‘轰炸机’了”！此后，鬼子再也不来砍树了。

高白镇的鬼子，每五天往狐狐山上送一次粮食和军需品。我们摸清这种情况，就在鬼子送粮物必经的路上埋设地雷。鬼子送给养时，一路上遭到爆炸，吓得心惊胆颤。后来，鬼子改变了办法，在路上先由扫雷队前行，送粮的跟随其后，每隔三五里，留下几个鬼子只放哨护路，以防返回时挨炸。尽管如此，因运粮送物死伤的鬼子也不在少数。虽然他们随时将尸体运走了，但人们到处能看到鬼子流下的黑血。从水泉沟至洛池渠，这里一滩，那里一片，人们见状无不大快人心。

抗日军民为了驱逐日寇，以顽强的精神，采用土打土闹的办法，斗得洋鬼子惊恐万状，无法立脚，从狐狐山上悄悄窜走了。

这个钉子拔掉后，山区一带的抗日斗争，更加活跃地发展起来了。

（作者原任清徐县长，现已离休。稿件经贾凝祥整理）

对敌斗争点滴

王 志 续

在一九四三年一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宣布投降的这两年多期间，我在西马峪村公所担任文书、副村长职务。负责发动群众支援和完成我抗日政府的活动和所布置的工作。

西马峪村地处清源边山，离城五里，系抗战游击区，是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。村公所受抗日政府的领导，对日寇进行应付。各种活动和工作，总是真心向我，表面随敌。对抗日政府的工作，如征收公粮、接养物资，以及其它方面的任务，都要冒险尽力，想法完成；对敌人方面的事情，即能哄则哄，能拖则拖，敷衍搪塞。万不得已，经抗日政府许可，应付维持。当时的对敌斗争，真是环境艰险，情况复杂，斗争相当激烈。现就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对敌斗争情况，回忆叙述如下。

搜集敌人情报

在对敌斗争中，情报工作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。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当时清源边山一带各村的情报工作，主要由我敌工站领导和组织。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是敌工站站长胡跃东（又名胡拓夫）和张国俊同志。情报一般是送往黄土坡程补四家，敌工站的同志不在时由该转交。情报内容，大体分为两种：一种是报告敌人的日常行动，如从城里出来多少敌人、武器装备状况，什么时间，到了什么地方，向何方去等等；另一种是报告某些特殊情

况，如城内敌人兵力的增减，敌伪机关和负责人员的变动，敌伪主要人员的好坏表现，敌人捉回去些什么人，杀害了哪些人，以及其它敌情新闻。这些情报，我们既送给敌工站，也送给区政府。当时，边山各村每天也得给敌人送情报。不过大部分报的是“无事”。有时也得应付一下敌人，经和邻村联系取得一致后，送一些八路军活动的假情报或过时情报。同时，我们利用给敌人送情报的合法身份和有利时机，搜集敌人情报。可是日寇鬼头鬼脑，汉奸便衣为讨好其主子，他们时时也在窥察我们的行动。东马峪、仁义村的两个情报员，被敌人发觉有嫌疑，即抓捕拷打，然后在仁义村白龙庙被惨杀。

一九四四年冬的一天深夜，我被急促的敲门声、呼唤声惊醒，有一个不相识的人送来一封急信，声称王参谋让我立即将信送往黄土坡，并说大批日本军出发了，让我也很快转移。事后我才知道，八分区的王参谋到离城只有二里地的六合村进行工作，晚上在一户群众家里，正和该村的两个人研究工作，突然日本鬼子闯进家里，将他们三人抓住。当时王参谋化装的是一个商人样子，身穿大棉袍，内插盒子枪，鬼子没有看出来，只把他们的胳膊捆住，没有皮身，让他们蹲在家里地上，由一个鬼子在门外放哨看守，其它日本鬼子就往别处去了。在这危急而又有隙可乘之际，王参谋三人相互悄悄把绳子解开，掏出手枪，立即将门外的哨兵打死，顺手拿起鬼子的步枪速跑。这时，在别处的日本鬼子听见枪声，呼喊乱叫，盲目打枪。王参谋们跑出院后，因持枪速跑不便，将步枪扔在地里。跑在半路上简单写了一封信，派六合村的一个人持信来西马峪村找我。当晚我亲自把信送到黄土坡。由于有了准确的情报，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日本鬼子没有得到什么便宜。次日，在边山一带，民兵游击队占据山头，日本鬼子爬伏山下，打了一整天，鬼子前进不得，爬山不能，到傍晚时刻，他们怕吃大亏，夹着尾巴窜回城去。

瓦解敌伪人员

抗战形势日益发展，日寇在各地不断遭受打击，敌伪人员逐渐感到他们效忠日寇已临穷途末路，加以我们瓦解工作的普遍开展，深入宣传对敌伪人员的宽大政策，致使敌伪人员思想动摇，和我们拉扯关系，向我们投诚的人员逐渐增多。

一九四四年，清源伪警察所的一个系长（姓名记不清了），在一次邂逅相遇的机会里，他问我：“郭健是不是经常到你们村里去？”我说：“有时也去”。他接着又说：“我在警察所做事，完全是为了生活，我决不做坏事。请你把这话转告郭健就行了，我也不希望八路军给我来信，以免让日本人发觉”。我听了感到很惊讶！我和这个系长根本不认识，他既知道郭健的名字，又让我给郭健转话，这好像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使我有点担心。后来我将这个系长的话告诉了郭健同志，并一同进行了分析。我们认为，此人是有心和我们打招呼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不会有什么别的意思。他向我们靠拢，表示不做坏事，这对他在行动上会有一些的约束。他这样做，我们是应该欢迎的。

有一个给日寇当翻译的，娶妻清源人。西马峪村的袁兰瑾与该妻是亲戚。这个翻译在形势所逼下，同时也了解我们对敌伪人员的政策，他通过袁兰瑾的关系，主动表示要向我投诚，但要求到延安去。并说，如我们答应这个条件，他还可以再联系几个人投诚。袁兰瑾将此事告我后，经和游击四大队参谋周斌同志、敌工站张国俊同志研究，可以答应他的要求，欢迎他们投诚。

在一九四五年日寇快投降前的一天，三个给日寇当翻译的人，带着三个时髦妻子、三支盒子枪和几个手提箱从太原逃出来，到了西马峪袁兰瑾家里。我们派了三头毛驴和民夫，由周斌同志相随，将他们送到白石沟清源县政府。县政府又把他们转送到延安。

掩护干部安全

在游击区不同于根据地，它担负着掩护干部的特殊任务。对来村工作的抗战人员，都要保护他们的安全。工作人员到村后，多数是通过村公所安排食宿。有些常来常往熟悉的同志，则往往是自己住在关系户家里。当时经常来西马峪工作的同志，有三区政府的区长郭健、助理员董四毛，游击四大队参谋周斌，敌工站副站长郭子华、张国俊，县武委会主任刘丰，民兵基干队武振宽、陈宏祥等同志。我们掩护干部的办法，一是慎重选择住处，并要严格保密；二是村公所的人员，要时刻注意敌情；三是依靠广大群众，有情况随时通风报信。工作人员要高度警惕，发觉敌情自动转移。由于注意了安全防范，西马峪村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，没有被敌人捉走过我方工作人员。但这不能说没有发生过任何险情。

一九四四年夏天。一次，有几十个日本兵突然来到西马峪，在村中河滩里坐着休息。当时有一个群众跑来告我。我知道周斌同志还住在河滩附近的张少泉院里，我急速前去告知，刚到了河滩这边，就看见周斌同志头戴洋草帽，身穿大挂，手捧竹兰，竹兰上盖一块白毛巾（可能里边藏的盒子枪），从容不迫地从距离日本兵一百多米的地方走过来，我俩使了一个眼色，即向西走去。这是一次危险的遭遇，如果过河滩时被日本兵看出来，那后果就很难设想了。

有一次，是在一天傍晚，我方侦察员小马，要从西马峪到都沟村去，我派乡地（村公所的佣人）袁林娃领路前往。走到都沟村堡门时，突然发现门里站的两个日本兵，小马立即用手枪射击，不巧是一颗瞎子弹，没有打响。日本兵拿刺刀就刺，小马伸手捉住刺刀，不顾手心割破流血，甩开刺刀，拔腿就跑。日本兵扑过来将小马身披的棉袍抓掉，刚要开枪时，小马已跑得较远

了。当时黑幕正落，看不清楚，小马幸免遭害，脱险而去。

捉拿敌伪汉奸

一九四四年秋天，满架葡萄刚刚剪完，绿油油的葡萄叶仍然覆盖着大地，秋风凉爽，景色宜人。这时，对敌斗争形势正在逐步好转，抗战胜利指日在望。一天，清源日寇的翻译王殿新和我三姐夫焦守中（农民，王殿新的邻居）相随，从清源南营留村来到西马峪，焦守中到了我家，王殿新去了财主张哲家。当时，被在村工作的我三区政府助理员刘冬喜同志发现，将王殿新捉住。

刘冬喜同志捉住王殿新后，把他带到村后葡萄架底。我听到这消息后很快也去到那里。刘冬喜同志用手枪对准王殿新，王殿新惊恐万状，怕立刻把他打死，苦苦哀求宽恕。刘冬喜同志反复对他讲解政策，进行教育，希望他能够改恶从善，为抗日政府做点事情。王殿新频频点头并乞求地说：“我家里有一支枪，愿送给你们，把我放了。”刘冬喜同志答应了他的要求，让他把手枪送到我家里，由我给他做保证。王殿新连声应承，回去后一定很快把枪送来。这样，王殿新被释放了。

王殿新回去以后，并未实现他的诺言，对送枪一事，置之脑后。这时，我们感到上当了。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，敌人是异常狡猾而不能轻易相信的。王殿新可能自认为家住县城附近，有敌人的保护，不送出枪来我们对他也无可奈何。但事实并不会像他所想的那样如意。

光阴荏苒，一年快过去了，枪还是杳无音讯。王殿新他没想到，革命形势会如此迅速发展，我们对县城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敌人在夜晚已不敢出城了，我们可以深入到县城附近进行活动。

一九四五年秋，清太徐县委组织了一次夜袭南营留村的捉敌活动。事前，组织部长任亮同志给我布置，让我设法把捉王殿新的路线等有关问题侦察清楚，特别要做到能在不惊动别人的前提

下，秘密进入王殿新家里。

王殿新家住清源县城南南营留村，该村和南关相连，跟县城近在咫尺。王殿新家是一座高墙砖房院，门关后很难进去。而焦守中和王殿新是近邻，院子相挨，只要能进到焦家，就不愁进入王家。为此，在捉王殿新的当天下午，我让我嫂嫂到南营留村把焦守中叫到六合村河堰上，做了具体安排。除得知王殿新这天在家外，并让焦守中晚上不要关锁街门，准备一架梯子，听到响动时不要作声。

这次行动的任务，除捉王殿新外，还要捉伪警备队中队长潘生云。县委组织了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。这支队伍主要是白石沟的民兵基干队和我村的部分民兵。当晚，由组织部长任尧和赵忠林在西马峪坐镇指挥。队伍半夜出发，由武委会主任刘丰带领，绕道北村，作了具体布置，他留在此地。然后兵分两路：一路由民兵英雄武振宽同志率领，我作响导，去捉王殿新；一路由南营留村的刘敬礼领路，去捉潘生云。

王殿新家在南营留焦家巷儿，地处村内靠南。我们到此之后，先派数人进入焦守中院内，从房顶架上梯子，到了王殿新房上，下到院里，开了街门，放进队伍，抗开王殿新住房的门子，进入里边，但王殿新不在家睡，只有他妻子一人，吓得她赤身裹被缩在炕角。经追问，说是王殿新进城打牌去了，她也不知道手枪的事儿。后经仔细搜查，人和枪都未发现。有些民兵，气愤难耐，临走时拿了王殿新家的一些零星衣物。有的民兵愤怒地说，这是汉奸财物，勒索群众而来的，拿走也该。当我们撤离回到西马峪村后，任尧同志让民兵把拿回王殿新家的东西全部交公。

去捉潘生云的这一路人马，原计划从西边进去，后因故绕到南边进村。潘生云住在小南门附近，去后顺利地将潘抓拿。当返回西马峪村边时，因民兵一时疏忽，潘生云逃脱。然后追捕捉住，押送到白石沟，以后转送到八分区。

这次行动，虽没有捉到王殿新，但捉住了潘生云。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县，对敌人震动很大，特别是家住城外的敌伪人员，早晚不安，心惊胆颤。有的怕被捉而躲进城内苟且偷安。

王、潘两家被袭击之后，王殿新狗急跳墙，在县城敌伪机关、部队里大肆活动。他叫嚷八路军把他家抢劫一空，有人说，他给敌人拉出的所谓丢失清单，纸还有几尺长。他如此虚夸谎报，其目的无非就是要煽动敌人，进行残酷报复。

敌人行凶报复

日寇宣布投降后，阎匪军强夺胜利果实，占据了清源城，袭击敌伪人员。这时候，抗日政府县长任悟僧、组织部长任亮调我离村到县政府工作。我走后不久，敌人到西马峪村进行大逮捕，抄了我的家。一天拂晓，一批敌人包围了我家，房顶上架着机枪。敌人从房顶上进到院里，踢开我原来住的房门，家里没有人（我女人怕敌人抓捕，已到北营村她娘家躲避），然后又叫我母亲的门子。当我母亲刚开门时，敌人朝天打了一枪，吓得我母亲摔倒在地，口吐白沫，由此瘫痪，数月后死亡。敌人在我家各个房间，乱翻乱搜，折腾得乱七八糟，损坏家俱，拿走东西。然后又到左邻右舍院里，东搜西查，连空房里的草堆，也用刺刀又捅又扎，可是谁也没抓到。

敌人气急败坏，实不甘心，就把我村里的成福生、成生有、王来锁和来喜儿四人抓走，扣押在县城爱乡团。抓进去，两天没有给吃饭，第三、四天，敌人把成福生（参加过捉王殿新）押到我村，在村边惨杀，将人头挂在枣树上示众。其他三人无故被扣押七天后放了回来。成生有放回来后，一次在煤窑沟里和我相遇，曾告我说，敌人捉住他们时，就带着杀我的布告，上面写着对我要“就地正法”，并追问他们：“王志续到了哪里？”显然，敌人这次到西马峪大肆捉人，无疑是王殿新策动的报复行

为。

这次敌人没有捉到我，恼羞成怒，丧心病狂。回去就将焦守中和我三姐提进监牢，严刑拷问，但他们始终没有招认。敌人不甘心，在一次杀人时，将焦守中一并绑赴刑场，背插亡命牌，跪在杀场作“陪桩”。焦守中作了陪桩，又被押回监狱行刑逼供，但他不吐露真情，后来还是搬上人送了贿赂，才被放了回来。我三姐在扣押期间遭受毒打，出狱后大病一场，几乎要了命。

袭击城关碉堡

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，敌人龟缩在城内。我抗日政府和地方武装活跃在广大农村，伺机打击敌人。有一天，我某部六连驻在西马峪村，决定攻打清源城关西门坡“山水庙”和西堡门两个警备队驻守的据点。

这天晚上，天气晴朗。大约在半夜，人们都已熟睡。部队的一个排三十余人，集合在灯山街上，带着两付担架、一架梯子。我村民兵队长成铁狗、退伍军人王富顺、成福生和我也都参加，从西马峪出发。然后，兵分两路：一路攻打西门坡“山水庙”；一路带有两挺机枪从外边攻打西堡门。

攻打“山水庙”的一路，由我村王满顺和成福生领路，从南营留村进去，通过南关，摸到“山水庙”门前，敌人没有发觉，但庙门关得很牢，一时冲不进去。庙门临街有一个窗户，我们从窗户扔进去几颗手榴弹，房里的敌人不知被炸伤炸死多少，只听得乱喊乱叫。同时又向房顶院内扔了一批手榴弹，炸得敌人昏头转向，胡乱打枪。我们的部队为了防止城内敌人出击，避免部队陷入重围，便迅速从原路撤出。

攻打西堡门的一路，有我村成铁狗和我参加。摸到离西堡门约二百米处，我们隐蔽在路南白菜地的一道堰子后面，望见堡门

房上的哨兵在哨楼外走动。“山水庙”那面打响后，我们这一路从堡门外架梯上房，向西堡门的敌人射击了一阵，打得敌人哭爹喊娘，当“山水庙”那面的枪声停下来之后，我们便迅速撤离返回。

回到西马峪后，部队没有任何伤亡。这次战斗，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，但也炸死炸伤了不少敌人。在广大群众中扩大了我们的影响。

（作者原任省建设银行副行长，现已离休）

忆抗日战争时期东木庄党支部的

建立经过

牛 荃

东木庄是清源县较大的一个村庄，紧靠汾河，未建二坝前，该村是由榆次县、徐沟县来往于清源县的必经之路，是一个较大的汾河渡口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这个村，富户很少，贫苦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。和一般村庄比较，文化比较发达，初、高两级小学校成立的最早，为什么村民贫苦而文化发达呢？因老村长是个武秀才，没有文化，所以他很重视办学校，校长由他本人兼任。

1937年10月（旧历）日本鬼子侵入东木庄，鬼子进村后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人民时时胆颤心惊，一年到头，过不上个安稳日子。

1938年，抗日武装就不时暗暗地来村内活动，有时住一宿，有时吃顿饭就走了。

到1939年，抗日形势发展很快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〔简称动委会〕主任肖靖同志（吉林省人），宣传部长张云同志（南郊区人），民运部长郝耀同志（汾阳县峪道河金庄村人），专门做支部工作的李景文同志（汾阳县城东关人），武勇同志（南郊王郭村人），江波同志（南方人），王恒芳同志（山东人），他们经常在清（源）东、徐（沟）西一带活动。在广大农村，他们组织青年自卫队，站岗，放哨，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革命的党，是